

#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历史演进及当代意义

刘思婕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摘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李泽厚先生用启蒙与救亡两大思想史主题解构中国近现代史后提出的著名观点,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屡屡为救亡运动压倒,导致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启蒙思想也未能得到广泛传播,造成了后来的各种灾难,启蒙又一次被提出。救亡与启蒙的当代指向是富强与自由,富强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富强的动力。如今,富强与自由的实现必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既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要求。

**关键词:**启蒙;救亡;富强;自由

“如何在深刻理解多年来沉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重新看待、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总结出它的某些规律,指出思想发展的客观趋向,以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这在今天,比任何时候,将更是大有意义的事情”<sup>1</sup>,这是李泽厚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的末尾写的一段话。“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是李泽厚先生认为的贯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主要逻辑。虽然学术界与思想界对这一观点存在广泛的争议,但其无疑具有自身的合理性。研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的当代指向,“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sup>2</sup>,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历史内涵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李泽厚先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著名观点。在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李泽厚先生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同的思想史主题来解构中国近现代史,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反而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封建主义由此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假借集体主义的名义大反自由,最终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自由、民主、科学等启蒙思想重新被人们发现和呼吁,绕了一个圈,又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以新文化运动为例,李泽厚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sup>3</sup>。但是,“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现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sup>4</sup>,因而,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思想启蒙的主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sup>5</sup>。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与思想界激烈的讨论。李泽厚先生后来在《启蒙的走向》一文中重申并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戊戌、辛亥乃至五四,都是为了救亡,关键在于,经过戊戌、辛亥之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文化上,认为只有革新文化,打倒旧道德文学,才能救中国,但中国近现代史的客观逻辑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救亡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取得了成果,但也种下祸根,表现为对成功不去作理性的分析,而是把以激情为内容的一切经验当作革命的圣物,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去继承去光大。因之,多元、渐进、理性、法治,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启蒙精神的具体发扬,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启蒙在今日的走向”

。

从本质上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的思想模式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模式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模式的逻辑引申,即启蒙对应着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救亡对应着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反帝的时代任务,双重变奏则体现着启蒙与救亡以及由此而引申的半封建与半殖民地和反封建与反帝的双重间性关系。理想状态下,启蒙与救亡应当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即救亡为启蒙创造更好的环境,启蒙为救亡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最终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进而实现富强与自由,而现实则是,民族独立与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救亡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由、民主、科学等启蒙思想在以广大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未能得到广泛传播,“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突出的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sup>7</sup>。

## 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当代指向

按照“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的思想逻辑,启蒙主要是指先进知识分子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思想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力图唤醒人民追求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实现自由;救亡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反帝爱国运动与反侵略斗争,另一层是指国内革命运动与政治斗争,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等都被视为救亡。启蒙与救亡在碰撞与纠缠中未能共同发展,“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sup>8</sup>。

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与自由必然无法实现,但若在救亡的进程中忽视了启蒙的作用,封建主义将会阻碍独立后的国家实现富强与自由。“由于民族生存的危机,反帝斗争压倒思想启蒙运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要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共同完成两方面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sup>9</sup>。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近现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越过了西方近现代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使得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主要成就几乎都集中在了社会政治思想上。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启蒙思想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自由笼罩在解决根本问题的革命的帷幕下被忽略,然而,革命的胜利不等于封建主义的消失与自由的实现,从体制到观念都留下了封建主义与忽略自由的深重印痕,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启蒙的历史要求突出地展现在了人们

面前,扫除一切封建残余,实现富强与自由,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改变经济基础,自由将成为空谈,而要改变经济基础,自由又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救亡指向富强,启蒙指向自由,启蒙任务虽然未能与救亡任务共同完成,但在救亡时期产生了丰厚的启蒙历史遗产。以五四运动为例,林毓生先生对其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区分,即五四的口号、五四的理念和五四的精神,认为“口号可以商榷,理念可以批评,但精神绝不能丢弃”<sup>10</sup>。中国的启蒙是现在进行时,特别是在没有救亡之虞后,启蒙更应得到重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遗憾不应重演,保证富强与自由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也因此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要求。

### 三、“富强与自由的相互促进”

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到“富强与自由的相互促进”,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华民族走上了富强的康庄大道;启蒙的任务虽然任重道远,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的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的迅速增强,自由的实现程度得到了较大提高。

富强包含着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的双重含义,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强大是人民富裕的基础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富裕离不开稳定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提供了政治前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建立了制度保障;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提高,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局面初步形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另一方面,人民富裕为国家强大注入动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只有尊重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人民富裕可以极大地调动人民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从而带来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推动国家的进一步强大。国家强大为人民富裕提供基础和保证,没有国家的强大,人民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富裕;人民富裕为国家强大提供人力、智力、财力支持,只有凝聚民心、集中民智、真正发挥人民的力量,才能为国家强大注入不竭的动力。

自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价值目标。经典作家阐释的自由具有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追求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发展的最终态势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就中国而言,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剥削的经济基础,在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保障的同时,也为人民的自由奠定了基础,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济独立和经济自由;从政治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各项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实现人民自由的原则,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保障了人民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从文化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自由的包含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不断丰富,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自由这一

根本价值目标的重视和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决心。不过自由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人民应该不断趋于自由,但同时人民的自由又不仅受着道德、法律等的规范和约束,而且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财富的增长分配等因素所制约。因此,自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需要通过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而进步和发展。随着现阶段市场化、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自由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高扬自由的旗帜,“这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激发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加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具有终极的定向作用”<sup>11</sup>。

富强与自由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富强即民富国强,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惟有发展,惟有富强,才能为自由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解决自由的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自由即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惟有把自由作为根本价值目标,才能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实现富强。富强与自由是两个动态的概念,富强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富强的动力,这与救亡与启蒙在理想状态下的关系颇为相似。中国近现代“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今天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宝贵的历史遗产。“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在今天已不是一个新观点,然而这一观点就其对富强与自由关系的指向来说,仍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第 499 页.
  - [2]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第 499 页.
  - [3]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第 15 页.
  - [4]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第 16 页.
  - [5]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第 44—45 页.
  - [6] 李泽厚. 走我自己的路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第 533—534 页.
  - [7]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第 55 页.
  - [8]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第 53 页.
  - [9] 丁守和.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 [J]. 历史研究, 1989 (3), 第 3—15 页.
  - [10] 林毓生. 热烈与冷静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第 314 页.
  - [11] 叶庆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第 188 页.
- 作者简介:刘思婕,女,汉族,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